

春秋末期 中原人民的反孔斗争

——斥孔子周游列国

河南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目 录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斥孔子周游列国

.....省博物馆 马世之（1）

“正名”的反动主张与复辟的罪恶活动

——斥孔子卫国之行

.....中共濮阳县宣传部、中共滑县县委宣传部（17）

春秋末期匡人的“困孔”斗争

.....中共长垣县委辛 毅（29）

病树前头万木春

——斥孔子讲学于宋

.....商 宣（37）

孔子——郑国人民眼里的“丧家狗”

.....辛正文（43）

彻底清算孔子在陈的罪行

.....周淮文（53）

孔子在叶复辟奴隶制的可耻下场

.....王兴亚（60）

孔子是劳动人民的死敌

——斥孔子上蔡之行

.....中共上蔡县委大批判组（67）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斥孔子周游列国

省博物馆 马世之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后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出生于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年青时期仅作过委吏和乘田一类的小官，为奴隶主充当会计和管理牛羊，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管刑法）兼代理宰相。他利用暂时窃据的权力，大搞奴隶主阶级专政，上台后的第七天，就捏造罪名，将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死，并陈尸三天，借以恫吓革新派，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但是，孔子的反革命黄粱美梦很快就遭到破灭，被迫下野了。

孔子在鲁国丢官后，仍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妄图螳臂挡车，继续抗拒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奴隶社会，他从鲁国窜到中原地区，东奔西走，游说诸侯，“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到处兜售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十四个年头。当时孔子的处境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最后在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怀着对奴隶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夹着尾巴滚回了老家——鲁国。这就是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大肆渲染、恣意美化的所谓“孔夫子周游列国”。

所谓孔子的“周游列国”，并不是游历了当时的所有国家，主要到过今河南境内一些诸侯国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先后去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除了曹国（在今山东西部）以外，其余国家部分或全部均在今河南境内。卫国在今豫北东部，原都朝歌（今淇县），后迁楚丘（今滑县），又迁帝丘（今濮阳县）；郑国在今郑州一带，都郑（今新郑）；宋国在今豫东商丘一带，都商丘；陈国在今淮阳一带，都宛丘（今淮阳县）；蔡国原在今豫东南一带，先都上蔡，后都新蔡，后又迁州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四九一年，今河南境内的蔡国土地并入楚国版图，由镇守负函（今信阳）的楚国将领沈诸梁直接管辖，并将部分居民迁到负函。楚国幅员辽阔，地处江淮流域一带，都郢（今湖北江陵县），今豫南广大地区皆为楚国领土。《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经过的蔡国和叶国（今叶县），是指其故地而言，实际上都在楚国疆域之内。孔子这次周游列国，在卫、陈停留时间较长，大约都有数年之久，其余各地仅仅作了短期的旅行。

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奴隶起义的烽火到处燃烧，变法革新运动风起云涌，腐朽不堪的奴隶制度日趋没落，新兴的封建势力正在各国兴起。以中原地区为例：公元前五五〇年，陈国发生了筑城奴隶的暴动；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的奴隶在今郑州圃田起义；公元前五二〇年，洛邑（今洛阳）出现了周王城百工的叛离。在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同时，各国都在积极变法。地处黄河南岸的郑

国，是一个变法较早的国家，公元前五四三年“作封洫”，重新编制田亩，划分土地疆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废除古老的井田制；公元前五三八年“作丘赋”，在承认个体农民合法性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田地单位计算，包括原来奴隶在内的土地私有者都要出军赋和服兵役，从而打破了以往“甲士”身分的限制，加速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公元前五三六年“铸刑书”，公元前五〇一年“制竹刑”，把改革成果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铸在金属鼎上或刻在竹简上公布于众，削弱和限制了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作了法律上的保障。在这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难以维持下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出现了奴隶主阶级统治下的社会危机。孔子对于上述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看到一种名叫觚（音孤gū）的酒器，就借题发挥，大声哀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过去饮酒用的觚都有棱角啊！现在的觚竟连棱角也没有了。这哪里还能叫做觚呢？这哪里还能叫做觚呢？充分表现他对社会变革的极端不满。孔子周游列国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将历史拉向后退，恢复觚的棱角，实现其复辟西周奴隶主贵族统治时代的反革命政治理想。

公元前四九七年，孔子亲自率领他的门徒——由他培养和训练的反革命精神贵族集团，来到今河南境内，奔忙于中原列国之间，依靠各国诸侯赐舍的一点残汤剩羹过日子。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他要是三个月得不到国君的理睬，心里就感到惶惶不安，非常焦急地要离开这个国家，一定带着准备好了的

同别国国君初次相见的礼物，再去另找买主。为了取得国君们的宠信并捞到一官半职，他迫不及待地周游了一个又一个国家。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首先看中的就是卫国。他认为“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保守落后的卫国，在政治上和鲁国一样腐败，正是他搞反革命活动的理想地点，孔子曾一度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这里。卫国由于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国内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孔子来到这里，为了挽救奴隶主统治的灭亡，就提出了一套加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办法。“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的所谓“富之”，就是要使破产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重新富裕起来；孔子的所谓“教之”，就是要把已经处于“礼坏乐崩”的奴隶制上层建筑重加整饰，妄图通过“富”与“教”的措施，稳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阵脚。但是，在卫和其它国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大势已去，奴隶制的残局是无法收拾的。孔子周游列国的可耻下场，将其一套所谓“富”与“教”的反动理论砸得粉碎！

孔子在卫国逗留期间，卫灵公一开始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奉粟六万，但仅仅是从生活上给包了下来，在政治上却没有给孔子任何官衔，这对到处找官做的孔子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孔子为了取得高官厚禄，曾经上窜下跳，“因卫夫人、弥子瑕而通其道”（《淮南子·泰族训》），不惜拜倒在权臣弥子瑕和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脚下。孔子一向轻视妇女，平时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同妇女交往。但当他

主动拜会南子这个声名狼藉的“贵”妇人时，他的谬论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入门，北面稽首”（《史记·孔子世家》），一进宫门，望见南子的帐帟，就赶忙趴在地上叩头。孔子晋见南子时那种可耻的场面，简直令人作呕。孔子和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言行不一，虚伪无耻，别看他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则是“男盗女娼”。为了实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他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用得出来的。

在楚国负函时，叶公沈诸梁告诉孔子，在其封地叶邑那里，有一个坦白、直爽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敢于出来告发。孔子听了以后说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父亲犯罪，儿子不能告发，父与子应该相互隐瞒，“正直”就包含在这“隐瞒”之中。据说，叶公听信了孔子的话，竟唆使叶邑长官将那个揭发父亲偷羊的年轻人判了死刑，其罪名是“直于君而曲于父”（《韩非子·五蠹》）。孔子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关系，竟然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公开包庇坏人坏事。无数正直的人们，因为反抗孔子的吃人礼教而惨遭杀害。

孔子一生为复辟奴隶制“官瘾”很大，为了欺世盗名，他竟以最有学问者自居，十分狂妄地宣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好象孔子理想中的周文王这个大奴隶主死了以后，古代的文化都集中在孔子一个人身上了。但事实给了孔子的自我吹嘘以无情的批判，由于孔子的主张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致使他到处不被重用，不受欢迎，在周游列国中，他坐够了国君们的冷板凳，政治上一

直潦倒失意，不能够实现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愿望。孔子做“官”的愿望实现不了，就非常苦恼地感叹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就是说，如果有谁肯用他去治理国家的话，只要一年时间，就能够初步推行奴隶制的政令，三年之后，就可以作出一番成绩来。尽管他这样大吹大擂，仍然得不到国君们的重用。孔子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平时最反对“犯上作乱”。但是当他对于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却大力支持。晋国大夫范氏家臣佛肸（音必吸bì xī）在中牟（今河北省西部）这个地方作宰令，背叛了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赵简子以后，派人召见孔子，孔子立即准备前去助其一臂之力，并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孔子说他不是葫芦架上的匏瓜，不能老是吊在那里当摆设而不作食品。可见他“做官”的心情何等急切，哪怕是到叛乱集团里充当一个小头目也愿意去干。针对孔子仕途失意的情况，子贡问道：“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遇到合适的买主就将它卖掉？”孔子竟然毫不隐讳地回答：“要卖掉啊！要卖掉啊！我就是在等待识货者哩！”（见《论语·子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到处寻找买主，不过他所兜售的并非什么“美玉”，而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破烂货，仅仅是加上了一些“仁”、“义”、“礼”、“道”之类的伪装罢了！听其言，观其行，听听说了一些什么话，就知道他要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孔子自楚返卫，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假如卫君让你来执政，掌权之后先干什么？孔子认为首先就是“正名”。“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在这里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正名论”。当时社会在急剧变革，西周时代的旧秩序已被打乱，过去一直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则变成了“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直至“陪臣执国命”。“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情况屡见不鲜，奴隶们是“民不堪命”，经常“犯上作乱”。孔子为了维护旧秩序和旧传统不被破坏，就以旧的、主观的观念——“名”去规范新的、发展中的客观事物；用唯心主义的儒家之道，来“正”奴隶制度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严格遵守自己的名分，不得有任何越轨举动。妄图利用“正名”的办法，来恢复没落奴隶主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

什么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天堂”？在孔子看来，就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统治下奴隶制的所谓黄金盛世。他曾经说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假如有人让他治理国家，他就要在东方将西周奴隶制度复兴起来。孔子认为西周承袭了夏、商两代的典章制度，比较丰富多彩，他要照着西周的那一套制度去办事。为了恢复西周奴隶制度，孔子还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反动政治口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复兴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世袭的统治权力，将那些丢权下野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到台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已任”，下决心做到“死而后已”。

孔子主张“仍旧贯”（《论语·先进》），不论作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老一套去办。提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末期，还要行夏代的历法，坐商代的车子，穿戴西周的服饰，演奏舜时的乐舞，禁止民间流行郑国的音乐，排斥主张革新的人。可见，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开历史倒车，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个全面大倒退。这样的反动政治企图，孔子却认为这才是“天下有道”的社会。他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政权集中于奴隶主阶级，至于奴隶连议论国事都不准许。可见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孔子主张复古，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制。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广大奴隶用血汗和智慧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奴隶主掠夺净尽。奴隶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毫无地位，在奴隶主的鞭子和棍棒下，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他们可以被任意屠杀和买卖，在奴隶主的心目中，奴隶只不过是一些“会说话的工具”。西周孝王时的“召鼎”上，曾经记载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只要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可以买到五个奴隶。在河南浚县辛村和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普渡村的西周墓葬中，都发现过奴隶殉葬的现象。如在普渡村发掘的一个名叫长佃的周穆王时代的奴隶主贵族坟墓中，除了出土一批成组的青铜器外，在他的脚下还埋着两个殉葬的奴隶。孔子所津津乐道的“郁郁乎文哉”的“理想国”，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吃人的奴隶制社会。然而他却用一些娓娓动听的言词，给它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仁”、

“礼”等反动说教掩盖了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到处兜售的反动政治主张，都是为了挽救奴隶社会灭亡而炮制的“治国的方法”。鲁迅曾经给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奴隶制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春秋末期，孔子却倒行逆施，为其大唱赞歌。他所设想的“治国的方法”，只不过是奴隶主贵族为了“治民众者”的方法，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孔子的反动政治抱负必然遭到新兴地主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决反对。恩格斯指出：“除非我们相信有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应该承认任何宗教的说教都不能挽救一个趋于死亡的社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孔子的反动学说当然不足以支持风雨飘摇中的奴隶社会。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和变法革新运动，最终埋葬了奴隶制度，使孔子精心炮制的“治国的方法”付诸东流。从复辟奴隶制的目的出发的“周游列国”，只不过是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股小小逆流而已，孔子这个奴隶制的顽固维护者，作为人民的罪人，最终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在游说诸侯时，孔子卑躬屈膝，露出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听说国君呼唤，孔子便慌得等不到把马套在车上，就立刻动身应召。“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踵踵如有循。”（《论语·乡党》）见到了国君，孔子就手执圭板，

不高不低，谨慎得好象拿不动一样；面容似乎有些恐惧，举足迟缓，仿佛在独木桥上行走。虽然孔子这样“事君尽礼”，但仍然得不到诸侯们的信任。孔子在卫国期间，卫灵公对他也十分讨厌。因为怀疑孔子搞破坏活动，就派公孙余假进行盯梢，孔子走到那里，他就跟到那里，甚至连进门出门都要受到监视。眼看在这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孔子才被迫离开卫国。

孔子离开卫都帝丘，前往陈国，道经匡这个地方（卫邑，今河南长垣县境），他们师徒被团团围困起来，不许随意走动。孔子惊慌失措，怕得要死，为了照顾自己的面子，就搬出了一套“天命论”来自我解嘲，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不得不祈求上天保佑。经过五天时间的周折，方才侥幸脱险。不久，他又困于蒲（卫邑，今河南长垣县境）。孔子自陈返卫的途中，路过蒲这个地方，当时公叔氏叛离卫国，占据蒲邑，不让孔子从这里经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过协商，蒲人要孔子不到卫国去，才肯放他过去。孔子答应了这个条件，并与蒲人订立了盟约。但是孔子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尽管他也侈谈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却是从来不讲信用的。孔子出了蒲的东门，一直朝着卫都帝丘的方向走去。他的学生子路问他，难道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回答：“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胡说这是在蒲人强迫的情况下订的盟约，可以违背。一到帝丘，他就立刻向卫灵公建议伐蒲。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孔子在卫国得不到重用的时候，曾经一度想去晋国找官做。当他走到黄河岸边，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这两个旧贵族，孔子的黄粱美梦立刻化作泡影。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激流，不禁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认为过不了黄河，去不到晋国，仿佛是命里注定一样。孔子赶忙调转车头，重返卫国。

孔子在宋国逗留期间，曾经受到太宰戴疆的奚落，“视之犹蚤虱之细也”（《韩非子·说林上》），在其心目中，孔子象跳蚤、虱子一样渺小，并拒绝他会见宋君。不识时务的孔子，还想赖在这里不走，竟带着他的学生在宋都商丘城外一棵大树底下演习周礼。宋国人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都很反对，有一个叫桓魋（音颓tui）的人甚至打算将孔子杀掉。孔子听说桓魋要杀他，一方面故作镇静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一方面“微服而过宋”（《孟子·万章》），换了衣服，偷偷越过宋境，狼狈逃窜。等到桓魋赶到树下，发现孔子已经逃去，一气之下，就把那棵树给刨了。

但是最严重的要算是“陈国绝粮”了。孔子自陈去楚的途中，刚刚离开宛丘就受到了陈国士兵的包围。孔子师徒被围困在荒郊野外，不让定，也不给饭吃。学生们大都病倒，饿得站不起来，只有孔子还强打精神，在那里装模作样弹琴唱歌，以鼓舞士气。孔子在陈国被围困了七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师徒有一段自供状式的谈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孔子向他的徒弟们说：“我既不是兕牛和老虎，为什么被围困在这旷野里呢？莫非是儒家之道不对么？”子路认为“吾未仁耶”和“吾未知耶”，是由于孔子的“不仁”、“不智”

引起的。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史记·孔子世家》）子贡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太不识时务，所以遭到普遍的反对，要求孔子改变一下自己的主张。结果都挨了孔子的一顿臭骂。孔子为没落奴隶主贵族效忠的反动学说，遭到各国新兴封建势力和劳动人民摒弃之后，他还贼心不死，硬要用它来干预陈国的政治，从而遭到强烈反对，这就造成了“陈国绝粮”事件。

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孔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行径非常气愤。鲁国一个看守曲阜城门的人，指责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郑国的劳动人民骂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在卫国，孔子因为没有捞到政治稻草，就以击磬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一个背着草筐的老人听到孔子的磬声，走过他的门口说：“有心哉，击磬乎！硃硃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批评他太不识时务了，要他算了吧！一次孔子坐着车子正在楚国境内行走时，大约在今豫南某地，忽然跑过来一个人，他的名子叫接舆，劈头拦住孔子的车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将孔子比作倒霉的凤凰，除了嘲笑之外，还警告他要接受以往的教训，别为了升官发财继续在列国乱撞了。还有一次，大约在今河南叶县境内的澧水岸边，孔子师徒迷了路，就叫他的学生子路去向正在田间劳动的长沮、桀溺打听渡口，这两个农民把孔子奚落了一番，不告诉他渡口在那里。孔子气得破口大骂，胡说什么“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无耻地把劳动人民比作鸟兽，正说明孔子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不久，

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走失散了，子路到处找不见他，就向一个拄着拐杖、背着柳条筐的老农去打听，老人十分轻蔑地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一个不劳而食的寄生虫。春秋末期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跖，曾经怒斥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矫言伪行”，“妄作孝弟”，是个“罪大极重”的“盗丘”和“巧伪人”。充分揭露了孔子的反动本质，是奴隶阶级对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忠实走狗孔子之流的严正声讨。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不受欢迎，“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师徒，深知其反动政治企图不可能得逞，他的学生子路供认：“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孔子本人也曾说过：“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反动的政治主张行不通，这是孔子意料到的事情，既然行不通，干脆乘上一个小木筏子，一下子驶向那怒海狂涛之中，甘心情愿作一个奴隶制的殉葬者。

孔子带着他的一帮学生在今河南境内流浪了十四年。最后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返回鲁国。这漫长的十四年，是他睡思梦想恢复奴隶制的十四年，是他疯狂反对新生事物的十四年，是他招摇撞骗的十四年，是他到处挨打、四面碰壁的十四年。孔子周游列国的可耻下场，雄辩地证明了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人，最后必然落得身败名裂，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孔子死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他在中原地区这一段政治流

浪生活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为了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不时打出“孔家店”这面黑旗，抬着孔子这具政治僵尸，到处毒害人民。他们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将孔子周游列国这一段政治流浪生活吹得神乎其神，明明是到处碰壁，却偏要说成很受各国欢迎的样子。历代的反动文人墨客，也以孔子“周游列国”为题，吟诗作赋，对之百般美化。一些御用历史学家，更浪费了不少笔墨，写出《孔子厄于陈蔡考》、《孔子过匡论》等烦琐考据，来为孔子的反动行径辩解。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历代的尊孔派也给修起了所谓文庙，并挂起了“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金字匾额。在今河南境内，还可以看到一些所谓“圣迹”，什么“宣圣台”、“弦歌台”、“文雅台”、“辙环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集孔子反动思想大成的《论语》一书，是在孔子死后由其学生们整理而成的孔子生前言行录，其中不少篇章记述了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散布的反动言论，过去一直被当作儒家的“圣经”，受到反动派的狂热吹捧。宋朝宰相赵普，甚至提出要用半部《论语》来“致太平”。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窃取了伪大总统的职位以后，为了进一步登上皇帝的宝座，曾经一再提倡尊孔读经，胡说什么“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独夫民贼蒋介石，一手掂着血淋淋的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手捧着“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桂冠，给孔子戴在头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背叛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来后，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的《论语》等书，开始了他吹捧孔子破坏革命的罪恶生涯。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反华、反共、反革命的需要，也拜倒在孔子的脚下，声嘶力竭地叫嚷：“孔